从“全球化”到“一带一路”：中国视角下的世界文学格局新变化

张希琛

© 2018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1），61–68 页

内容提要：自1827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研究领域仅仅将“世界文学”视作一个美好、虚幻的文学乌托邦。然而，随着20世纪末“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不断密切各国交流，“世界文学”理念再一次被文学领域频频提及；到了2013年，中国提出了全球化发展新阶段的旗帜性倡议——“一带一路”，其平等、包容之精神内核又进一步推动了“世界文学”新体系的逐步形成。本文以“世界文学”为出发点，聚焦于“全球化”兴起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这两个重要节点，探讨在这两段进程中，以中国文学作者及研究者为代表的中国视角下，世界文学格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中国文学将以怎样的身份参与到这一变化之中。

关键词：世界文学 全球化 “一带一路”中国文学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如果说在过去几十年间，受到全球化的冲击，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疆界被逐步瓦解，与此同时包含中国文学在内的许多被边缘化的文学被重新带入了全球视域；那么当下中国“一带一路”这一宏大计划的提出，则可以说是为世界文学格局的重塑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具体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有两大特点。一方面，与原有的“丝绸之路”内涵不同，新时代的“一带一路”突破了过去仅局限于周边商路沿线国家的模式，提供了一个跨越洲际，欢迎世界各国进行平等交流、互惠互助的国际平台。区别于当下欧美各国将重心放在了自身内部发展的策略调整，该倡议旨在关心世界各国共同发展、鼓励全球参与。因此，该倡议也自然吸引到越来越多希望能够加强国际间合作的国家参与进来。另一方面，相较于当前突出的诸如宗教极端恐怖主义盛行，核威胁等级提升，气候变暖趋势严峻，人种、性别歧视严重这些以冲突性为特征的全球问题，“一带一路”倡议不站在任何一个秉持友好往来原则的国家或地区的对立面；此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参与这一计划也并不以其与中国外交关系的远近亲疏作为唯一凭借。换句话说，“一带一路”提出的着眼点并非在于消弭差异，而是在尊重各国独立性的基础上，通过相互扶持，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这一合作倡议，实际上是在中国国力增强、在国际舞台掌握了更多话语权的背景下，提出的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特色全球化发展新方向。其不仅仅有利于推动全球化焕发出新的发展活力，就文学层面上来说，也将有可能为世界文学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在此基础上，我们是否可以提出一个假设，那就是：随着该倡议的不断深入，一种带有“一带一路”特质的世界文学全新体系将逐步确立起来。为了验证这一假设的可能性，本文将从“世界文学”这一理想内涵出发，着重探讨从21世纪初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直至以“重塑平等、包容、均衡的全球化文明”[1]为目标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1 王义桅，《“一带一路”开创包容联动共享的新型全球化》，《求是》，2017年5月16日

这些现象对文学、文化领域产生了并将产生哪些影响。更具体来说，本文将以中国文学研究者以及第三世界国家背景下的中国文学为视角，分析中国学者对“世界文学”范畴及格局在不同阶段所发生变化的应对态度，展望新时期将会为各国文学发展及世界文学全新体系的塑造带来的可能，以及中国学者应当如何看待这些变化与中国文学在这一过程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历史回顾：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学者对世界文学的态度转变

“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歌德于1827年提出的。他指出：“民族文学的意义现在已经不大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开始，每个人都应促进其发展进程……我有一个乐观的预见，即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时代，民族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世界文学可能很快就会到来”。[1]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构想无疑是远超其时代对于文学的认知，他不单单发现了这一全新的文学走向，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该理念的最终达成是密切的民族交往所带来的结果。但在当时，由于欧洲中心主义仍是文学的绝对导向，因而“世界文学”的概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仅仅为少数有着鲜明的精英意识的比较文学学者在一个极其有限的空间所讨论……这种狭隘的世界文学观不仅没有包括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也没有包括超越欧美之外的世界各个地区的文学实践”[2]。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好构想。

然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极大拉近了世界各国间的距离、打破了原有因地域产生的交流隔阂，这为“世界文学”走向现实提供了新的机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文学发展，很早就给予了密切关注。自本世纪之初开始，随着“全球化”概念为人所熟知，其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就逐渐纳入了探讨范围之内。当时，在许多中国学者看来，全球化是西方扩张的结果，因而他们一方面既警惕西方意识形态，即“他性”渗透到本国文学的“我性”中去，同时又认识到全球化将会为各国的特色发展提供更多可能。在这当中，有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华圈”这一文化版图构想。在具体描述中，这一概念是以中国为话语中心，并将东亚、东南亚共同纳入到了一个文化联合体当中。[3]这一想法，其实颇具一定的前瞻性，因为这当中体现了中国学者面对全球化浪潮，有意识地去突破原有的西方话语中心，顺应世界多元化的大背景来进一步扎实共同基础、扩大中国文学文化影响力的前沿理念。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及话语权都处于劣势，这一构想并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此外，“中华圈”的构想尽管提出了联合多国文化，但其实际上侧重的还是保护本国文学文化、而非主动融入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我国许多学者对全球化的态度谈不上是十分积极。

此后，伴随着后殖民理论在全球化语境下所引发的重新关注与解读，中国学者转向去试图强调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文学文化的边缘地位，从而呼吁一种更为均衡、不刻意忽视第三世界国家的全球文学语境。与之前不同，该时期有洞见的中国学者不再一味突出思考中国在世界一体化中应当如何保留特色这一问题，而是借由赛义德、斯皮瓦克、巴巴等具有双重身份的后殖民理论家的观点，提出“文明的共存与对话”[4]。这一转变，看似是当时的中国学者们对于西方文学地位的让步，实则却不然。因为只有当文学、文化之间实现了彼此接纳与理解，世界文学的概念才能被赋予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义，而非仅仅停留在西方学者乌托邦般的幻想中。因此，中国学者所迈出的这一步，对于中国文学努力赶上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来说意义重大。然而，这个阶段所存在的问题是，单从中国文学角度出发所提出的关于对话与交流的期待，实际上仍只是中国学者或具有第三世界国家背景的西方学者的单方面愿景，

1 约·歌德，《歌德论世界文学》，查明建 译，《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2期，第5页。
2 王宁，《世界文学与中国》，《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4期，第12页。
3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第18页。
4 王宁，《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理论批评》，《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第21页。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而西方文学界并没有以同等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文学、文化价值。

而到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左右，“翻译”成为了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眼中、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世界文学理念的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在这当中，一个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被用来描述全球化商业现象的名词——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进入翻译领域：

> 在全球化/少数人化的双峰对峙的情势下，世界语言体系已经大大地“被重新绘图”了，原先处于霸权地位的一些语言，如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逐渐走向衰弱和萎缩，而另一些新崛起的语言则变得越来越通行，例如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汉语，因而导致了新的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因此，我们用“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一术语来描述世界文化在未来的发展走向应该是十分恰当的。[1]

学者在这里所强调的，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语言与文化应当如何重新定位的问题。就中文来说，随着这一语言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用中文书写的文学作品不应当还仅仅局限于满足中国人的阅读体验，而是要立足于全球的文化消费市场，让更广范围的人了解到源于中国本土但并不缺少全球性关怀的优秀文学作品。在这一过程中，翻译恰恰是实现文学作品全球本土化的关键媒介。孙艺风就指出，翻译要做的就是跨越打破并解构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间的隔阂与差异，通过将本土文化进行全球语境下的转换性阐释，从而在加强跨文化交流的同时，提升本土文化的认知度。[2]不同于前一个阶段中国学者的单方面畅想，在该阶段，随着全球化密切程度的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学尽管仍未在西方学者定义下的世界文学范畴内进入中心领域，但世界文学却实实在在向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学敞开了大门。许多中国学者恰恰是注意到了这点，因而呼吁中国文学通过翻译“走出去”，在保留特色的基础上走向文化认同的融合趋势。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的作品经由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翻译，融入国际市场、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例子，证明了中国学者们在这个时期对于世界文学新变化的关注，以及选择翻译这一手段作为中国文学走向全球化的途径的判断，都是十分正确的。

根据上述就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中国学者在“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上不断产生的思想转变与理念调整的梳理可以看出：一方面，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剧使“世界文学”这一原先颇有理想主义意味的概念逐渐成为未来文学潮流的可能走向，这一变化势必使得更多国家的文学有机会被更广阔的市场认识并接纳；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在不断探索着一条让中国文学不再处于边缘化，可能加入到一个更平等的、不以西方观念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疆域中的合适路径。这当中尽管有一些想法受制于时代、因而没有实现进一步的成熟与完善，但它们都为创造一个打破边缘-中心概念的文学新格局做出了必要努力。同时，这样的观念转变过程也更使我们认识到：如果说世界文学是当今全球化推动下文学发展的大势所趋，那么只有边缘文学、文化背后所代表的国家实力得到提升、在国际上掌握了足够的话语权，其文学才有可能追赶上这一大趋势，从而真正实现一个无偏见、无盲目追随的文学繁荣共同体。

然而，由于近几年全球地区冲突频繁发生，宗教、人种间敌视情况不断恶化，这一文学理想当下似乎有“难产”的可能。尤其当美国试图从诸多耗费其人力、财力的国际责任中脱身，英国放弃欧盟合作并将欧盟这个共同体当作影响本国发展的“负担”时，这些“利己”色彩颇重的国家策略在使得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格局被进一步瓦解的同时，却并没有为全球合作打下良好基础，反而制造了一个没有中心、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就文学层面来说，如果没有了一个以平等、共荣为原则的国际联合局面的形成，新的文学格局将无从谈起。因此，当中国这个受到世界瞩目的快

1 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中国翻译》，2013年第2期，第6页。
2 孙艺风，《文化翻译与全球本土化》，《中国翻译》，2008年第1期，第7页。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速崛起的大国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全球合作倡议并得到了多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认可之时，其为我们所期盼的新时代下世界文学发展新方向再一次提供了无限可能。

二、全新展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世界文学格局新设想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提出的：“借助全球化的力量，近40年我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1]，基于这样的条件，中国成为了当今国际舞台具有一定话语权的国家，也在有意识地承担更大的责任。“一带一路”便是现阶段中国对于自身及世界整体发展的一个回应。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近年来全球化浪潮为各国带来的益处不再凸显、其局限性日渐清晰，“一带一路”这样一个以“包容性”为核心理念，致力于提升全球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水平的倡议，成为了全球化发展新阶段的鲜明旗帜。那么，在文学、文化领域，“一带一路”究竟能为世界文学格局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根据该倡议的精神内涵及当前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见到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改变。

首先，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文学间的联结将超越地域，“世界文学”范畴将真正得到拓宽。习近平在2017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主旨演讲中提到：“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2]在该倡议精神之下，文学领域的研究不应再仅仅固守东亚文学、欧洲文学这样按照地域分门别类的思想，而是应该做到真正的跨文化、跨语言交流，这其实也是比较文学的价值所在。学者周宪就提到过，

> 文学研究有自己的独特问题，这就需要文学研究者齐心协力地合作……首先产生关于文学跨文化研究的核心层面的共识，然后进一步发展出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核心层面，最终将这些问题落实到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去加以检验，并不断地做出调整和修正。[3]

在这当中，内蒙古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于2015年举办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与中国蒙古族对比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在这当中，有共计21位来自中澳的学者就少数民族及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语言、教育、社会文化、文学等领域提出了各自的见解。[4]这一研讨会将地处中国内陆边疆的少数民族与澳洲原住民联系在一起，尽管二者所处地域及民族、语言、经济状况都截然不同，但这两个地区都面临着如何在官方语言之下继承民族特色语言，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建立个人的身份认同、保持民族根性，以及如何保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等诸多本质上具有共性的问题。可以预见的是，以此次研讨会为开端，今后无论是描写蒙古族文明的小说《狼图腾》还是讲述澳大利亚原住民身份认同的文学作品《卡彭塔利亚湾》，这些来自不同国度与民族的作品都能被置于同一个文学研究平台，并且通过多国学者的比较研究，能够给予两个相隔大洲大洋的民族文学交流的珍贵契机，从而实现彼此相互借鉴、共同启示的“世界文学”理想。在以前，尽管有许多优秀的研究、翻译澳大利亚文学的学者已经为澳洲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从本质来讲，其中的大多数文化研究与传播是单向的。换句话说，在中澳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许多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中国也建立起了完整的澳洲文学研究体系，其文本范围覆盖澳大利亚经典、当代等各个时代；相较而言，这个过程之中，中国文化向澳洲传播则是十分有限的：较少有学者将澳大利亚文学与中国文学文本相联系，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与交流。而“一带一路”所创造出的各国合

1 刘卫东，《“一带一路”：引领包容性全球化》，《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年第4期，第333页。

2 节选自“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文字实录，新华网，2017年5月14日。http://www.news.cn/world/brf2017/kmszb/wzsl.htm

3 周宪，《跨文化研究：方法论与观念》，《学术研究》，2011年第10期。

4 赵澍、郭亚楠，《记“澳大利亚原住民和中国蒙古族对比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语言文化研究》，2015年，第157页。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作交流的重要机遇，恰恰会使更多来自不同语言及文化背景的学者有机会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现其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在这样的比较研究中得到启示，探索跨地域合作的无限可能。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受到“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文学与文学研究者们，将深刻认识到：他们曾经提出的诸如建立“中华圈”以使汉语语言文化在全球化大潮下得以生存的想法实则存在颇多局限；而与之相较，跨文化的联合才是全球化语境下的真正需求，更进一步说，“世界文学”理念也只有在唤醒更多国家与地区的文学的基础上，才可能成为现实。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的特色精神将使各国文学得以在保持其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全球化的价值关怀，“世界文学”的概念也将得到升华。当下的热门研究，无论是女性研究、酷儿理论还是少数族裔研究、生态批评，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其一方面关注弱势群体的权利、需求问题，力图实现性别、性向、种族、宗教、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与平等。这些研究所强调的平等与无区别对待，并非在消弭差别，而是在呼吁对多样性的尊重与关注；另一方面，这些研究的共同主题之一就是呼吁在全球化浪潮迅猛推进的今天，每个国家及地区的人不应只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相互斗争与隔离，而应将全人类看作命运共同体，为了世界的共同福祉而奋斗。实际上，这一当下的研究趋势，是在将文学与文化研究相融合，使得文学在今天被赋予了体现具有世界范畴的价值共识的使命。从这个角度来讲，世界文学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一带一路”这一全球倡议之下所鼓励的世界文学，其关注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范畴，而是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儒家学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传奇剧，还是当代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巨作《百年孤独》，它们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国度与历史背景之中，并由此展现出不同的文学特色，但却都是值得全人类阅读的作品。因为在它们的思想内核中所表现出的对人与自然之和谐，人文精神之成长，文化之交融与传承的关注，都是现如今全人类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对于当下文学研究者来说，“一带一路”为“世界文学”概念所赋予的意义也正是在此：它以平等的眼光聚焦于世界各国的文学，既不否认每一种文学的独特性，更力求在其间寻找这些文学的世界性。鲁迅先生曾经提出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便可以看作是全球化下世界文学内涵的最好注脚。

其三，“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广将使得文学的审美范畴能够实现进一步的包容与丰富，世界文学价值的判断也将变得不再单一。在原有的以西方价值为中心的社会文化观中，许多西方学者“采用西方文明发展所积累的经验作为参照系，并将西方文明固定在进化图谱的顶点。在此基础上，全球被分为西方和非西方：西方具有现代性，而非西方则是西方的‘过去时’和‘他者’。人类文化由此形成了高－低、现在-过去、中心－边际这样数组二元对立”[2]。也正是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之下，非洲被看作未开化的土地，南亚、东南亚及拉丁美洲则成为了西方作家笔下病菌的滋生源头。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强，在一些老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势头逐渐衰弱的同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崛起并成为了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国际力量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失去了原先绝对的文化话语权；而越来越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学者站了出来，他们批判原有价值体系下对第三世界国家形象的随意贬低与丑化，努力宣扬亚非拉地区文学与文化的真正价值。以这一趋势为基础，“一带一路”国际倡议在推动世界文学格局变化当中，将能够体现出两大重要意义。其一，由于这一倡议是由中国这个第三世界国家提出，其不依赖于任何西方价值体系并且得到了其他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积极响应，我们不妨做出这样一个

1 节选自“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文字实录，新华网，2017年5月14日。http://www.news.cn/world/brf2017/kmszb/wzsl.htm

2 陈榕，《欧洲中心主义社会文化进步观的反话语——评阿切比<崩溃>中的文化相对主义》，《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159-160页。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假设：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世界文学将能够摆脱长期以来受到的西方专断价值观的挟持，在以第三世界国家为基础力量的共同努力之下建立起一个以“平等价值观”为核心、重视世界各国不同文学特色的全新文化体系。尽管彻底动摇西方中心的根基、创造全新范式的道路必定漫长且艰难，但这一能够打破原有不平等价值观的文化体系的突破性理念，想必会为世界文学带来新的活力与生机。其二，随着越来越多国家与地区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当中，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密切，这将使得更多第三世界国家受到更广泛的关注。这一改变，就可以为这些国家创造良好的契机去弘扬本国颇具多样审美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从而打破别国对本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文学、文化的神秘化印象与曲解性解读，真正让本国文学艺术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今年中国两会期间，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便提出了设立“一带一路”中国国际文学奖的构想。何提到：“‘一带一路’国际文学奖即便不设中国作家参与，对其也是一个重大利好的消息……文学奖的评选过程，也是文化和情感交流融通的过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肯定存在，但文学所表达的情感没有任何阻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们了解得其实还很不够，通过设立文学奖，可以让中国读者知道更多好作家和好作品。”[1]从何建明的提议中，我们也能看到中国学者们在“一带一路”可能会为文学多样性带来的重大意义上做出的积极展望与精确判断。

事实上，由于“一带一路”倡议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其后续发展规划也并未完全展开，因此很难去全面估计该倡议将对世界文学格局变化产生怎样的影响。但通过以上三点“一带一路”可能带来的变化的判断，已经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其在引领世界文学走向文学全球化浪潮的新阶段、让“世界文学”这一大胆构想有机会成为未来文学普世价值观中不可取代的作用。

三、中国视角：“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文学新课题

针对全球化影响下中国文学的前景，包括莫言、迟子建、格非在内的几位中国作家在2008年举办的“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实际上是颇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学视角下的“全球化”思考。莫言就指出，尽管全球一体化加速了全球文学的趋同，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文学领域的学者可以放弃同外国优秀文学作家、研究者加强沟通、以交流增强文学体悟。[2]不同于莫言对于全球化下文学发展的乐观态度，迟子建、格非等作家则强调了当下中国文学应当立足于本国优秀文化传统，保持文化及文学的特性。[3]这两方面的观点实则无关对错，它们结合起来正是中文学者理应对本国文学前景做出的辩证性思考。

然而，不同于“全球化”是源自西方、并在很大程度上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大潮，“一带一路”其倡议国恰恰是中国这个身处第三世界阵营、其文学仍未跻身文学中心的国家。因此，在“一带一路”的依托之下，中国学者应当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将在世界文学格局变化当中扮演何种角色、迎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具体来说，中国文学将面临以下两大课题。

第一、是关于中国文学研究“走出去”的问题。在谈到中国学者其文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便是：当下，只有极少数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会被外国权威文学研究机构所认可并采纳；而对于其余大多数学者来说，他（她）们得到的来自西方的反馈多为“不信任、不接受”。在解释其中的原因时，王宁指出了两点关键问题：

1 节选自何建明：设立“一带一路”中国国际文学奖，以文学交流感情，《中国青年报》，2017年5月8日。http://zqb.cyol.com/html/2017-05/08/nw.D110000zgqnb_20170508_1-05.htm

2 刘洪涛、张珂，《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11月，第56页。

3 同上。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 首先，由于长期以来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广大读者对东方国家及其人民，包括中国和中国人民，形成了一种固有的偏见……这些无疑都影响了普通的西方人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兴趣。其次则是优秀的翻译的缺席……（这使其）无法与西方以及国际学术同行进行深入和平等的学术交流和对话。[1]

就他所提到的第二点来说，许多学者也已注意到这一现象，这也就是为何他们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左右就频频论证翻译对于世界文学新图景构建的重要意义。而对于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只有牢牢把握“翻译”这一与西方学者进行同语境交流的重要媒介，才能让中国本土的文学研究真正成为被世界文学研究所接纳、认同的一部分。而针对前一点关于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问题，这不单单需要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努力，更要依靠整个国家其影响力及国际形象的不断提升。当前中国迅速崛起的大国形象及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已然为吸引西方国家来了解中国文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作家及文学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在扎根中国悠久文明、文化精髓的同时，积极在中国文学当中寻找其与世界其他各国文学的契合点，从而增强不同文学间的了解与借鉴。此外，在国内的文学市场之中，中国学者也应始终明确自身所肩负的责任，那就是只有通过加强中国读者对本国文学的认同感，才能让世界各国看到中国文学对于民众精神之培养、国家力量之塑造具有的深远意义，这样才可能会促使他们去主动了解中国文学及中国视角下的文学面貌。

第二、是关于中国文学在眼下世界文学中的“双重使命”问题。对此，王宁指出，

> 全球本土化的世界文学实践必定有一种中国的版本，或者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全球本土化的世界文学的中国版本。它消解了世界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固有思维定势，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学之林铺平了道路。[2]

这一观点实际上准确契合了“一带一路”倡议之中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中国的目标在于：一方面，促使世界各国在全球一体化基础上实现更为广泛的平等合作，由此展现中国当今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将该倡议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一步，通过与多国的互惠互助，加快中国自身发展、进一步提升其国际地位。因而，在此基础上的中国文学也自然承担了双重任务。第一重就是要以中国文学作为依托，发起、建立一个前文所提到的各国文学平等发展的全新文化体系。在该体系之下，研究重心将不再局限于欧美文学，而是将广泛向世界各国投射，消解一直以来以西方作为文学研究主场的意识，从而使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得到公平对待及全面发展。在这里有一点需要强调，那就是与过去的西方/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不同，此处提到的全新文化体系本质上并非要以中国文学作为中心或主导，而是要将中国文学看作一条更好地串连起“世界文学”大概念的纽带，从而给所有国家及地区的文学创造传播、交流的契机。第二重则是，中国文学作家及研究学者应牢牢把握住“一带一路”这一重要机遇，在这一倡议推进过程当中，尝试以更包容开放的心态，主动去接触世界各国有真正文学价值的作品，积极学习世界前沿思想、理论，将中国文学读者的定位拓展到世界范围之内，从而创造出符合时代精神及全人类共同诉求的中国文学作品，让中国文学努力向世界文学中心靠拢，真正在当下的世界文学领域中拥有话语权。

上述两个课题，与其说是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文学应当做出的行动与认知调整的探讨，不如说是对其背后中国文学写作者与

1 王宁，《“一带一路”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人文杂志》，2016年第9期，第5页。
2 同上，第2页。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研究者提出的新阶段要求。中国学者应该认识到：无论是“全球化”还是“一带一路”，其最初仅仅投射在经济领域，而真正将这些概念引入文学领域，并积极探索它们对于文学影响的，恰恰是作家与学者们。因此，面对“一带一路”，中国学者的态度绝不该是抗拒或抵触，而是要看到这当中的无限机遇，在辩证评估本国文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努力提升其文学在世界整体格局中的地位。

四、结语

通过回顾全球化概念普及以来，中国文学领域对于世界文学概念理解的变化以及展望“一带一路”全球合作倡议提出之后世界文学格局新定位与中国视角下的具体构想，从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在文学范畴上，不断深入的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它使得这一记载人类文明的最伟大艺术形式之一从分散、封闭逐渐走向联合与开放，从而让世界更广范围内的人都能够享受到文学所带来的独一无二的启迪与反思，也推动“世界文学”的伟大构想一步步走向现实。另一方面，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放大了全球一体化概念的积极效益，让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边缘文学开始更加积极地思考其在世界文学构筑中的角色，并有意识地加强文学交流，实现平等发展、共同繁荣的文学理想。从“全球化”到“一带一路”，我们看到了中国学者在世界文学格局演变中对“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辛勤追索与思考，因而也有理由相信：中国文学学者有责任也有实力帮助世界文学塑造起一个平等、开放的全新格局。

世界文学，未来可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文系）

责编：索宇环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